

『福建与海洋』

系列丛书（第一辑）

丛书主编 ◎ 杨国桢 高健斌

古代福建 佛教的海洋传播

兰惠英 ◎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非虚构

『福建与海洋』

系列丛书（第一辑）

丛书主编◎杨国桢 高健斌

古代福建 佛教的海洋传播

兰惠英◎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福建佛教的海洋传播/兰惠英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8. 6
(“福建与海洋”系列丛书/杨国桢, 高健斌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7-5334-8161-2

I. ①古… II. ①兰… III. ①佛教—传播—历
史—福建—古代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2736 号

“福建与海洋”系列丛书 (第一辑)

丛书主编 杨国桢 高健斌

Gudai Fujian Fojiao de Haiyang Chuanbo

古代福建佛教的海洋传播

兰惠英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25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79650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江金辉

印刷 福建东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 邮编: 350002)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数 317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8161-2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总 序

201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与我探讨，希望能策划一套丛书，我毫不犹豫地建议以“福建与海洋”为主题。之所以有此建议，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省份，福建海岸线漫长，沿海岛屿众多，又因为西北部武夷山脉的阻隔，从远古先民开始，就选择了向海洋进发，开展了大量水上活动。在闽地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后，海洋活动同样层出不穷，留下了大量海洋文化方面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历史文献记载。在研究海洋文化方面，福建省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次，从学术界的动向看，近年来学术界大有反思和研究，以杨国桢、吴春明等学者为首，大力呼吁重视海洋文化的研究，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海洋文化研究开始摆脱“大陆文明中心”的学术立场，确立“海洋人文”的学术视野，并慢慢摆脱了边缘地位，开始登堂入室。

再次，从国家与社会的大气候看，随着人类社会迈进21世纪，海洋越来越受到重视。“海洋强国”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海洋文化已经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海洋文化的学术课题开始持续出现在国家重大研究课题中。我们认为，这种对海洋文化的重视将会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大趋势。

天时、地利、人和，都摆在面前。这种时机，作为福建的学术研究者，作为福建的出版机构，毫无疑问一定要牢牢把握。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在他们的努力下，“福建与海洋”丛书选题得以通过。作为一套开放性的丛书，其中第一辑五本专著，经福建教育出版社申报，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对于整套丛书，我们的定位是基础性的全面研究项目，涉及海洋聚落考古、沉船考古、港市历史、海防体系、传统舟船与民间造船法式、航路

体系、海洋宗教信仰、海洋渔家、海洋移民、对外交流、海洋石刻等领域。总体的思路是：在学者们已开展过较高水准研究的领域，希望能在对原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提高的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调查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原来不为人重视、未开展研究或研究水平尚有较大提高余地的领域，拟通过全面的田野调查、文献搜集，言人所未言，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成绩。

希望通过我们这套丛书，将福建在海洋文明史中的独特和重要地位，较为全面且较为新颖地展示出来。争取做到这一套丛书出版后，能作为福建省情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体现出福建的文化大省、文化强省风采，另一方面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向社会各界提供准确的信息。

我们深知，这一目标的实现，绝非易事，但同时，我们也对实现这一目标充满信心。我们深信，通过各位学者的努力，“长风破浪会有时”，一定能看到“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成功。

高健斌

2017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印度佛教传入福建	1
第一节 佛教传入中国	1
第二节 佛教传入福建	5
第二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福建佛教的海洋传播	8
第一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福建佛教	8
第二节 拘那罗陀入闽	9
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福建佛教的海洋传播	17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福建佛教	17
第二节 隋唐五代时期福建佛教的对外交流	31
第四章 两宋时期福建佛教的海洋传播	82
第一节 两宋时期福建佛教的发展状况	82
第二节 佛教典籍的编纂及大藏经的刊刻	85
第三节 两宋时期福建佛教的海外交流	112
第五章 元代福建佛教的海洋传播	167
第一节 元代福建佛教的发展状况	167
第二节 福建佛教与各国的交流	169
第六章 明清时期福建佛教的海洋传播	194
第一节 明清时期福建佛教的发展状况	194
第二节 明清时期福建佛教的海外传播	208
第三节 郑和下西洋与福建佛教的海外交流	283

第七章 从外销瓷器窥见福建佛教的海洋传播	291
第一节 福建外销瓷窑场生产的具有佛教内涵的器物和纹饰	291
第二节 福建生产外销瓷的主要窑口	299
结语	312

第一章 印度佛教传入福建

第一节 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产生于古印度。到公元前三世纪，佛教被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定为国教，并且开始向外传播，中国的佛教毫无疑问是从印度传进来的。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和线路历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有两条，即西域的传入和南方海路的传入。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南方还有滇缅道，是经今缅甸、云南一线入川的陆路传入，如此算来，便有三条传入通道，传入的时间与传入方式因线路的不同而不尽相同。

一、佛教的西域传入

关于佛教从西域最初传入中国内地的准确年代，学术界历来也是众口纷纭，仅中国佛教协会编著的《中国佛教》统计就有 11 种。依时间先后，分别是：三五之世伯益说、周昭王佛法已来说、孔子深知佛为大圣说、（战国）燕昭王时传入说、秦始皇时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说、汉武帝时休屠金人说、张骞通西域始闻说、东方朔劫灰说、西汉成哀时刘向叙列仙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授）浮屠经说、东汉明帝求法说等。^①

在学术界，人们通常把汉哀帝元寿元年（前 2 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一事，看作是佛教传入内地之始。此说源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 2 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

^①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第一册，知识出版社，1979 年，第 3—4 页。

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闲、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① 这里的“浮屠”是“佛陀”的早期译语，“桑门”是指出家僧人。

关于博士弟子景卢或秦景宪、秦景等接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授）佛经的记载，除上述《魏略·西戎传》外，还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太平御览·四夷经》等。伊存授经是中国史书上佛教最初传入的最早记录，被认为是中国人最早接受佛经、佛学思想的可信记录，表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正如汤用彤所言：“最初佛教传入中国之记载，其可无疑者，即为大月氏王使者伊存授《浮屠经》事。”^②

二、佛教的南方海路传入

传统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最早是经西域由陆路传入，此所谓“陆路说”（汤用彤、羽田亨等学者持此主张）。而季羨林在《浮屠与佛》里提出了佛教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见解，但从海上还是陆上传入未加肯定。他推测：“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据我的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佛教是从印度飞到中国来的。它可能先从海道来的，也可能是从陆路来的。即便从陆路经过中亚小国而到中国，这些小国最初还没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国来的过路而已。”^③ 但后来他又修正了自己所持的观点，说：“我原来的假设：佛教最初是直接来自印度传来的，现在不能不修正了，改为佛教是间接传进来的。”^④ 并且也赞同汤用彤的观点。依据史料及考古发现，佛教最初进入内地也可能从印度取道海上而来，因此国内外一些学者提出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取自海道，

①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859页。

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③ 季羨林：《浮屠与佛》，《季羨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2—13页。

④ 季羨林：《佛教传入龟兹和焉耆的道路和时间》，《社会科学展现》，2001年，第2期，第229页。

即所谓佛教初入海上说的观点。冯承钧说：“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之西域之于阆也。旧日传说或以佛教输入事在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见《三国志》卷三十注引《魏略》），或以事在明帝永平四年至十八年间（61—75年），皆属传说而非史实。《后汉书·天竺传》后志明帝感梦事，亦为传说之一种，殆出袁宏《后汉纪》，亦非实录。是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① 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中说：“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氏、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② 冯、梁两位先生在佛教初入中国内地这个问题上，否定了陆上说，肯定了海上说。吴廷璆、郑彭年二位学者也提出：佛教东传早期大体经由海路而非陆路的观点。^③ 此观点与冯、梁二位一样全面否定了佛教初入中国的西域传入，并且还明确了传入的时间，认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即一世纪中叶楚王英所信的佛教是从印度直接传来的，原因是由于那时使用“浮屠”。^④ 李刚提出“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同样主张佛教最先由海路传入中国。认为早期佛教的传播是观念的传播，佛教率先流行的西域滨海地区的“胡人”为文化的载体。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开始，这些“胡人”以奴隶、商人、艺人、佛教徒等身份从海上入居东南沿海地区，从而把佛教带进了中国，其明显的表现就是当时本地区民俗观念的巨大变化，今天所见的狮、象、鸽子等象征性动物形象，堆塑器、塔式罐之类的象征性建筑造型以及“托钵僧”佣、胡人佣和佛像等，就是佛教文化从战国以后至东汉时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流行的

①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谢方的导读”第6页。

② 梁启超：《中国佛教研究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③ 吴廷璆、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8页。

④ 吴廷璆、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32页。

艺术积淀。^①其明确了佛教海上传入的时间更早，为公元前二世纪左右，传播方式是以“胡人”作为文化载体的观念的传播。

近年来，有学者还认为佛教初入中国内地的路线存在着陆路和海路两条。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镰田茂雄、张晓华、宋晓梅等。镰田茂雄说：“关于后汉、三国时代佛教初传期的传播路线，我认为尽管光提到从中亚经西域传到长安、洛阳的内陆路线，但还不能简单地忽视经南海的路线。……安世高巡回教化中国南方的传说，还有一个关于佛教传播路线的暗示。”^②后来，镰田茂雄还明确了佛教传播的路线，说：“从来认为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中国是最古的经路，若孔望山的石刻像（详见后述）确实是佛教像，而且是后汉的东西，则佛教早就经由南海传播到东海沿岸地方，南海航路相当早就发达了，佛教也是通过这条路传到中国东海岸的。”^③张晓华认为，佛教初入中国路线有西域和海上两条，时间大致都在两汉交替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同中印、中国与中亚的商业活动有密切的关系。^④宋晓梅从考古遗存考察佛教初传中国的路线，认为：佛教初传时期，南方和西域通过不同的途径，依靠各自的传播方式，形成最初的佛传根据地，并继而将佛的信息传递到中原，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多元的，陆路和海路在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是同等的，似不必分出孰先孰后。^⑤

笔者也赞同佛教初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是逐渐地而且是从不同的方向、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来的。在北方，由印度经中亚，沿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在南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至广州、交州等

① 李刚：《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5期。

② [日] 镰田茂雄：《中国佛教史》卷一，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149页。转引自张晓华：《对佛教初传中国内地时间及路线的再考察》，《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第20页。

③ [日] 镰田茂雄：《受容期的佛教》，《中国佛教史》卷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76页。转引自吴廷璆、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0页。

④ 张晓华：《对佛教初传中国内地时间及路线的再考察》，《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第21页。

⑤ 宋晓梅：《从考古遗存引发关于南北两路佛教初传问题的思考》，《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63页。

地，再进入中国内地，传入时间大致为两汉之际。从海路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是佛教观念的传入，对民俗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从西域传入中国有文献记载，更让人信服。

三、滇缅道

近年来根据考古发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还存在取道缅甸而来的一条路线，但是佛教最早传入内地不可能取该道而来，因为汉武帝时曾采纳张骞的建议，欲打通从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再通往安息、大秦的陆路交通，但没有成功。后来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建立永昌郡，开通滇缅路，但迟于楚王英信佛的年代，所以佛教最早不可能经由滇缅陆路入四川直至中原汉地。

第二节 佛教传入福建

那么，佛教传入福建的时间和路线又如何呢？据福建地方杂记《西山杂记》载：东汉永平十年，楚王刘英派大中大夫沙世坚入闽，为畚家人建三天竺庵即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于晋江一带。^①由于缺乏佐证，蔡永兼的“佛教于东汉由陆路传入福建”这一说法无法确信。

笔者认为，佛教最初是由南方海路传入福建的。西汉时期中印的海上通道得以开通，其路线在《汉书·地理志》中有详细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

^①〔清〕蔡永兼：《西山杂记》。转引自黄世春：《东石访古》，《福建文博》，1992年第1期，第72页。

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① 以上记载表明中印海道的路线是：广东→印度支那半岛→马六甲海峡→马来半岛→印度南部→斯里兰卡。而且自汉武帝以来，印度南部的黄支国遣使朝贡。由此可知，海上交通的开辟为佛教从海上传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王荣国考察东南沿海海上的交通史，认为从汉代起至东吴以至南朝，东南沿海已成为通往广州、越南以及西域的海上通道，福建则是这条海上通道的要津。^② 据《后汉书》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係。”^③ 《三国志·吴书》记载：“建衡元年（269年）春正月……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珣、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勋、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④ 这里的“东冶”是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无诸为闽越王，定都东冶即今福州市，“建安”即今建瓯市，均属今福建之地。可见东汉、三国时期朝贡征战取海道的均经福建。福建是中印海道通往内地的一个中转站，所以佛教最初传入福建的路线是南方海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先传至广州、交州等地，再进入福建。虽然史书缺乏两汉时期西域僧人取海道来华的记载，但六朝时期取海路来华屡见于史书记载。根据石云涛对六朝时期经海路入华传法僧人的统计，这些入华外国僧人主要来自四个地区：一是中亚，二是天竺，三是师子国，四是扶南。

来自中亚的僧人：①原籍康居，世居天竺的康僧会，于吴赤乌十年（247年）到建业。②支彊梁接于吴废帝五凤二年（255年），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后抵达广州。③昙摩耶舍于东晋安帝隆安年间（397—401年）初达广州，住白沙寺。④佛驮什于宋景平元年（423年）届于扬州。⑤求那跋摩于元嘉元年（424年）被接到广州，后至建邺。

来自天竺国的僧人：①维祇难于吴黄武三年（224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赉昙钵经梵本。②耆域先至交州，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

①〔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0—1671页。

②王荣国：《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

③〔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三，《郑弘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1156页。

④〔西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167页。

到达广州。又从襄阳过长江，于惠帝末年（306年）至洛阳。③求那毗地于齐建元初（479年）来至建康（今南京），住毗耶离寺。④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⑤智药三藏于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来广州。⑥菩提达磨，初达宋境南越，入梁，末又北度至魏。

来自师子国的僧人：①南朝宋元嘉五年（428年），师子国“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台像以为信誓”，开以僧人为使之先河。②南朝宋时师子国于元嘉六年（429年）和元嘉十年（433年）曾两次派遣比丘尼入南朝宋。

来自扶南国的僧人：①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年），扶南国王派天竺僧人那伽仙奉表贡献。②僧伽婆罗于梁朝天监五年（506年），被敕征召于扬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讫十七年。③曼陀罗于梁初大赉梵本远来贡献，梁武帝命他与婆罗共译《大乘宝云经》《法界体性无分别经》《文殊般若经》等共十一卷。④须菩提，陈言善吉，于扬都城内至敬寺，为陈主译《大乘宝云经》八卷。⑤歌营国僧人菩提拔陀，先至南朝梁朝，又到北朝洛阳。⑥拘那罗陀（真谛）先至扶南，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年）到广州。①可见，文献所载三世纪后有不少西域僧人取海道来华传法。据此可以推测，两汉之际也有可能西域僧人取海道来华。

佛教初入福建的时间，王荣国推测很有可能在东汉至东吴这一时期，经海路来华的西域僧人来福建活动并将佛教传入福建民间。不过，这一时期经海路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佛教并没有获得发展。此后，福建与东南沿海其他省份一样，其佛教是从中原向南传播发展起来的。②笔者基本赞同王荣国的观点，福建的早期佛教是由入华的西域僧人经“海上丝绸之路”而传进来的，但传入时间可推测到两汉之际至东吴时期。

① 石云涛：《六朝时经海路往来的僧人及其佛经译介》，《许昌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76—77页。

② 王荣国：《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

第二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福建佛教的海洋传播

第一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福建佛教

东汉末年封建大一统的局面崩溃，儒学独尊的地位也随之瓦解，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多元局面。在玄学流行的同时，中原佛教也获得发展的条件。西晋封建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最重要的莫过于允许汉人出家为僧，从而为佛教的发展提供僧源保障。佛教借助西晋王朝的行政力量向各地传播，佛教寺院也随之出现以至增多。福建在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也开始兴造佛教寺院。据文献记载，有纪年可考的寺院有：药山院、灵塔寺、绍因寺、建造寺、林泉寺、广福灵耀院等一批寺院^①，表明在太康年间之前佛教已传入福建，而这些寺院的出现是佛教在福建获得发展的表现。

东晋是个偏安江南的朝廷，但基本上承袭西晋的佛教政策，对佛教采取接纳的态度。而帝王、贵族、名士对佛教信仰的热情之高，却为西晋所不及，从而促使佛教在江南迅速推广，寺院大增，据统计，东晋共有佛寺1768所。福建东晋时与西晋相比，佛寺虽有所增加，但量很小。有年代可考的，仅有回龙寺、水陆寺、永和尼院、憩庵，以及《法苑珠林》记载的“建安太守孟景欲建刹立寺”^②和《高僧传》记载的“释僧群曾结庵于罗江县（今宁德）霍童山”^③。

① 王荣国：《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10页。

② 〔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四十，《舍利篇三十七·感应缘》，中华书局，2003年，第1270页。

③ 〔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二，《霍童山释慧群》，朱恒夫、王学钧、赵益注释，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03页。

东晋末年，权臣刘裕于公元 420 年废恭帝司马德文，自立为帝，国号“宋”，从此南方开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依次更替的历史。在北方，也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朝代的更迭，从而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在南北朝对峙的约 170 年中，佛教因南北不同区域的主客观因素制约，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在北朝，佛教受到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发动的排斥佛法运动的影响，致使“北地佛教，一时绝其声迹”。与北朝佛教迭遭厄运不同，南朝虽然也几经政策更替，却没有太大的动荡，社会较安定，为南朝佛教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原因是统治者的支持，而且他们大都信奉佛教，梁武帝还皈依佛教。正是由于南朝各统治者倾心佛教，佛教才得以借助中央集权的行政力量在南方迅速推广。

在南朝版图内的福建，佛教发展受宋、齐、梁、陈各小朝廷佛教政策的支配与统治阶级的扶植，南朝福建地方官员对佛教亦多持支持态度，社会上的富裕人家和普通民众也大力拥护。因此，南朝福建佛教得以迅速发展。但是，南朝福建佛教发展的整体轨迹与南朝佛教的整体发展趋势不尽相同。南朝佛教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宋、齐发展迅速，至梁代达到高峰，陈时走下坡路；而南朝福建佛教在宋、齐发展较慢，梁、陈两代则是高峰迭起。

南朝时福建佛寺建造大大超过前代。据王荣国统计，单有文献记载的就有 65 所，实际数量可能胜于此。但这几十所寺院分布并不均衡，即使宋、齐、梁、陈各个小朝廷统治期间也是各有侧重。梁、陈时期是南朝福建佛教发展的顶峰，东南沿海是当时福建佛教最活跃、最集中的地带，尤其以晋安郡治所所在地及其沿海近邻地区为中心，内地闽北一带佛教力量薄弱，发展缓慢，基本上奠定了此后福建佛教以沿海为重心的地理分布格局。^①

第二节 拘那罗陀入闽

前章分析了佛教传入福建的时间可能在两汉之际至东吴时期，而根据

^① 王荣国：《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31—32 页。

文献记载，南朝陈永定二年（558年），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入闽，则拉开了福建佛教对外交往的序幕。

如前所述，佛教传入中国有水路和陆路之分，南朝时往来于中国和印度间的求法、传法僧侣中，不少是循海道而行，其中拘那罗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汤用彤从记载这些僧侣事迹的佛教典籍中，考知那时与西方海上往来的东亚一端的重要港口有四处，即交趾、广州、山东半岛的胶州湾以及梁安郡。^① 这个“梁安郡”，就是跟拘那罗陀入闽时有着不同寻常关系的重要港口。

拘那罗陀（499—569年，Gunarata，又译拘那罗他），一名拘罗那陀（Kulanatha，又译拘罗那他，意译真谛、亲依、家依），又名波罗末陀（Paramartha，又译波罗末他），古印度（天竺）西北优禅尼国（Ujjaini）人，姓颇多堕（Bharata），种波罗门，世称“真谛三藏”。在我国佛教历史上，晋代鸠摩罗什、南朝拘那罗陀、唐代玄奘、义净另一说为“不空”并称“四大译经家”。拘那罗陀的翻译能力极受后代推崇。他所译出的经论64部，现存30部，多为佛教学者重视，其中《摄大乘论》和《摄大乘论释》成为我国南方摄论学派的理论依据。

南朝梁中大同元年（546年），拘那罗陀应梁武帝之邀达于南海（郡治今广州），后随即北上，因沿途各地停留两年，于太清二年（548年）八月至建康（南京）。梁武帝对他深加礼敬，使住宝云殿；正着手翻译佛经，因爆发“侯景之乱”，故辗转于苏、浙、赣，后入闽中。

《续高僧传》本传有拘那罗陀在闽期间的记载：“陈武永定二年（558年）七月，还返豫章，又止临川、晋安诸郡。真谛虽传经论、道缺情离、本意不申，更观机壤，遂欲汎舶往楞伽修国。道俗虔请，结誓留之，不免物议，遂停南越，便与前梁旧齿重覈所翻，其有文旨乖竞者，皆镕冶成范，始末轮通。至文帝天嘉四年（563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芳问。谛欣其来意，乃为翻摄大乘等论，首尾两载，覆疏宗旨。而飘寓投委，无心宁寄，又汎小船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追逐，相继留连。太守

^①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0页。